第一章　党项羌内迁及其社会经济

第一节　　早期党项羌的社会生活

一、早期党项羌的分布

西夏主体民族党项羌族为我国古代西北羌族的一支，大致在公元 6 世纪后期南北朝时期就已登上历史舞台。《旧唐书·党项羌传》载：“党项羌在古析支之地，汉西羌之别种也。魏晋之后，西羌微弱，或臣中国，或窜山野。自周氏灭宕昌、邓至之后，党项始强。”此外，《新唐书》、《新五代史》、《旧五代史》、《宋史》，都作了大体一致的记述。“党项羌在古析支之地，汉西羌之别种也”，这段文字很重要，一是说明了党项羌的族源为“汉西羌之别种”，二是指出了早期党项的居地。

《后汉书·西羌传》云：“赐支者，《禹贡》所谓析支也。南接蜀汉徼外蛮夷，西北〔接〕鄯善、车师诸国。”这一地区曾是西羌的主要居地。汉代西羌曾大量内迁到河陇及关中一带，而留居在原地的广大羌族，西晋末年被鲜卑吐谷浑所统治，党项羌就是吐谷浑统治下羌族的一支。

在吐谷浑的东部，有两个羌族建立的政权——宕昌（中心在今甘肃宕昌）与邓至（中心在今四川南坪），它们也一度臣属于吐谷浑。[①] 公元 552 年，西魏将吐谷浑势力逐出邓至，邓至亡。

① 周伟洲：《吐谷浑史》，宁夏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61—62 页。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北周保定四年（564），北周灭宕昌。邓至、宕昌与党项同宗同源，它们灭亡后一部分融于党项，加之吐谷浑势力的退缩，党项羌遂强大起来，故史载“自周氏灭宕昌、邓至之后，党项始强”。或以为宕昌为党项之音转，实际上宕昌融于党项之中，成为后来党项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隋书·党项传》指出的，“其种有宕昌、白狼”。

早期党项羌分布较广，《隋书·党项传》说：“东接临洮（今甘肃岷县）、西平（今青海西宁市），西拒叶护，南北数千里，处山谷间。”《旧唐书·党项传》则进一步指出：“其界东至松州（今四川松潘），西接叶护，南杂春桑、迷桑等羌，北连吐谷浑，处山谷间，亘三千里。”

《隋书·女国传》载：“女国在葱岭之南……数与天竺及党项战争。”葱岭即今帕米尔高原，此女国为西女国，似乎党项势力一度深入到黄河河曲以西数千里的崇山峻岭之中，这样才有可能与葱岭之南的女国发生战争。① 早期党项势力虽一度深入到河曲以西的广大地区，但其活动中心则维持在河曲至松潘一带。

一般认为党项名称为中原汉族对其的称谓。北方突厥则称其为“唐古特”（Tangut），立于唐开元二十三年（735）的突厥文“毗伽可汗碑”就可以证明。② 唐古特（唐古）应为党项的异译，也即北方民族沿用了内地汉族对党项的称呼。③ 吐蕃称党项为

①黄河河曲及其以西数千里分布着为数众多的羌族部落，《隋书》卷 83《附国传》曰：女国“东北连山，绵亘数千里，接于党项。往往有羌：大小左封、昔卫、葛延、白狗、向人、望族、林台、春桑、利豆、迷桑、婢药、大硃、白兰、叱利摸徒、那鄂、当迷、渠步、桑悟、千碉，并在深山穷谷，无大君长。其风俗略同于党项，或役属吐谷浑，或附附国。”党项崛起后，它们中的一部分与宕昌、邓至一样，融于党项之中。

② 岑仲勉：《突厥集史》下册，中华书局 1958 年版，第 914 页。

③ 周伟洲：《唐代党项》，三秦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6 页。

“弭药”,拓跋[①]等部内徙后，“其故地陷于吐蕃，其处者为其役属，吐蕃谓之弭药”。后来弭药又引申为对党项建立的西夏国的称呼。

党项人亦自称“弭药”或“弥人”，《文海杂类》“番”释：“此者党项也，弭药也，番人之谓。”[②] 歌颂党项祖先的《夏圣根赞歌》开头几句是：“黔首石城漠水畔，红脸祖坟白河上，高弥药国在彼方。’[③]

二、早期党项羌的社会生活

《隋书》与《新唐书》、《旧唐书》的《党项传》均有关于早期党项社会生活的记载，其中《旧唐书·党项羌传》的记述最为详细：

> 其种每姓别自为部落，一姓之中复分为小部落，大者万余骑，小者数千骑，不相统一。有细封氏、费听氏、往利氏、颇超氏、野辞氏、房当氏、米擒氏、拓拔氏，而拓拔最为强族。俗皆土著，居有栋宇，其屋织犛牛尾及羊毛覆之，每年一易。俗尚武，无法令赋役。其人多寿，年一百五六十岁。不事产业，好为盗窃，互相凌劫。尤重复仇，若仇人未得，必蓬头垢面，跣足蔬食，要斩仇人而后复常。男女并衣裘褐，仍披大毡。畜犛牛、马、驴、羊，以供其食，不知稼穑，土无五谷。气候多风寒，五月草始生，八月霜雪降。求大麦于他界，醞以为酒。妻其庶母及伯叔母、嫂、子弟之

① 《隋书》、《新唐书》、《旧唐书》等书作“拔”,《宋史·夏国传》作“跋”，为统一体例，除引文外，一律作“跋”。

② 史金波、白滨、黄振华：《文海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543 页。

③ 陈炳应：《西夏文物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346 页。

妇，淫秽烝亵，诸夷中最为甚，然不婚同姓。老死者以为尽天年，亲戚不哭，少死者则云夭枉，乃悲哭之。死则焚尸，名为火葬。无文字，但候草木以记岁时。三年一相聚，杀牛羊以祭天。

这段文字大致勾勒出早期党项人社会生活的情况，反映出党项内徙前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父系家长制阶段，男子的劳动在社会上起决定作用，成为氏族部落的主要成员，妇女则降到从属地位，并在收继婚制下，被当做家族或家庭的私有财产，由具有家长权力的男性及其子弟加以继承。

促使原始氏族社会瓦解，父权制家庭形成的原因是私有财产的积累与战争掠夺。虽然早期党项羌地处高寒，土无五谷，但畜牧业较为发达，剩余产品与对外贸易开始出现，“求大麦于他界，醞以为酒”。隋大业五年（609），隋炀帝西巡狄道（今甘肃临洮）时，党项前来进贡方物[①]；唐高祖武德二年（619）十一月，党项与吐谷浑并遣使朝贡[②]；武德九年（626）又遣使朝贡。[③] 朝贡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交换。

有了剩余产品和畜群，必然会带来崭新的社会关系——私有制的萌芽。一方面，畜群由氏族部落公有开始向部落首领私有演变；另一方面，为了满足这些大大小小部落首领的贪欲，对外掠夺已不可避免。因而，在封建史家眼中，早期党项是“不事产业，好为盗窃，互相凌劫”[④]。“魏周之际，数来扰边。高祖为丞相时，中原多故，因此大为寇掠”[⑤]。唐高祖武德年间（618—

① 《隋书》卷 3 《炀帝纪上》。
② 《册府元龟》卷 970 《外臣部·朝贡三》。
③ 《旧唐书》卷 2 《太宗纪》。
④ 《旧唐书》卷 198 《党项羌传》。
⑤ 《隋书》卷 83 《党项传》。

626），党项寇略十分频繁：武德三年（620），党项、吐谷浑寇松州；[①] 五年八月，党项、吐谷浑寇洮、岷二州；[②] 六年五月，吐谷浑、党项寇河州（今甘肃临夏）；[③] 七年四月寇松州，七月再寇松州，十月寇叠州，陷合州；八年四月寇渭州（今甘肃陇西）；九年三月与吐谷浑寇岷州，五月寇廓州（今青海尖扎北），又与吐谷浑寇河州。[④] 当然，党项寇边不完全是其内部阶级分化的缘故，也包括隋唐统治者民族压迫引起的反抗。

上述可见，党项羌人内徙前，正处于原始公有制向阶级社会过渡阶段，即父系家长制基础上的军事民主主义阶段，即使没有后来的大迁徙，也会按照社会发展规律，过渡到有阶级的奴隶社会。

第二节　党项羌的大迁徙

一、第一次大迁徙

公元 7 世纪初，李唐王朝建立不久，旋即扫平群雄，混一海内，“党项、白兰诸部及吐谷浑、西域诸国咸畏惧之”[⑤]，纷纷内附。贞观三年（629）党项酋长细封步赖举部内附，大受优待，在其居地设轨州，授步赖为刺史。其他部落闻风而动，“诸姓酋长相次率部落皆来内属，请同编户，太宗厚加抚慰，列其地为崌、奉、岩、远四州，各拜其首领为刺史”[⑥]. 631 年又“诏遣使开其河曲地为六十州，内附者三十四万口”[⑦]。至此，只有拓跋

① 《旧唐书》卷 61 《窦威附轨传》。
② 《旧唐书》卷 58 《柴绍传》及《资治通鉴》卷 190。
③ 《新唐书》卷 1 《高祖纪》。
④ 《资治通鉴》卷 191。
⑤杜佑：《通典》卷 190 《吐蕃传》。
⑥ 《旧唐书》卷 198 《党项羌传》。
⑦ 《唐会要》卷 98 《党项羌》。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部大首领拓跋赤辞和吐谷浑王室通婚，结成抗唐联盟。贞观八年（634），在唐王朝的强大压力下，拓跋部内部发生分化，拓跋赤辞遂与从子拓跋思头内属，以其地为懿、嵯、麟、可三十二州，以松州为都督府，擢赤辞为西戎州都督，赐姓李，“于是自河首积石山而东皆为中国地”①。

党项内附前后，吐蕃奴隶主政权从青藏高原崛起，不断向外扩张，贞观十二年（638），“进破党项、白兰诸羌，率众二十余万屯松州西境，遣使贡金帛，云来迎公主”。接着又攻松州，败都督韩威，党项首领“诺州刺史把利步利并以州叛归之”②。贞观十五年（641）太宗答应文成公主入藏，与吐蕃联姻，唐蕃矛盾暂时缓和，但吐蕃争夺松茂，打通进兵西域道路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在吐蕃政权的强大压力下，党项诸部陆续从甘、青、川三省毗连的高原草地迁往西北陇右地区。③

党项羌的内迁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有的是唐朝同意或组织的迁徙，有的以姓氏、部落为单位自发迁徙，其中规模较大的是贞观以后拓跋诸部的迁徙。《旧唐书·党项羌传》曰：‘其后吐蕃强盛，拓拔氏渐为所逼，遂请内徙，始移其部落于庆州，置静边等州以处之。’两唐书没有记载内迁的具体时间，或以为在开元年间，或以为在贞观年间。这里有两个关键性问题，一是拓跋部在吐蕃的逼迫下内迁，二是内迁是经唐朝同意并有组织进行的。

如前所述，贞观十二年(638）吐蕃兵临松州，给唐朝与拓跋部带来了极大的威胁，但后来唐蕃达成妥协，641 年文成公主入藏联

① 《新唐书》卷 221《党项传》。

② 《资治通鉴》卷 195 唐太宗贞观十二年。

③有关党项内迁，参见周伟洲《唐代党项》，三秦出版社 1988 年版；史卫民《党项拓跋部的迁徙及其与唐五代诸王朝的关系》，载《内蒙古大学学报》1981 年增刊；汤开建《隋唐党项部落的迁徙》，载《西夏文史论丛》，宁夏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

姻，双边保持和平友好关系，直到唐太宗与松赞干布去世。

此外，李世民羁縻党项，封拓跋赤辞为西戎州都督，赐姓李，目的是为了遏制吐蕃势力，当时唐蕃斗争还未见分晓，唐朝不会轻易把拓跋等部迁走。贞观末，太宗与松赞干布相继去世，吐蕃势力再度向北扩张，至永隆元年（680）前后，“吐蕃尽据羊同、党项及诸羌之地，东接凉、松、茂、嶲等州，南临天竺，西陷龟兹、疏勒等四镇，北抵突厥”①。为了保存实力，党项拓跋等部在唐朝同意下，有组织地迁到陇右庆州等地。

《资治通鉴》也把拓跋等部的内徙定在贞观以后，“贞观以后，吐蕃浸盛，党项拓跋诸部畏逼，请内徙，诏庆州置静边军州处之。又置芳池都督府于庆州怀安县界，管小州十，以处党项野利氏部落’②。这次党项部落内迁的规模较大，除拓跋部外，还有野利、把利、破丑等部。③

贞观以后在党项羌大迁徙的浪潮中，还有许多有组织或无组织的迁徙。《新唐书·地理志》：“禄山之乱，河陇陷吐蕃，乃徙党项州所存者于灵、庆、银、夏之境。”《旧唐书·党项羌传》称：“其（指党项）在西北边者，天授三年内附，凡二十万口，分其地置朝、吴、浮、归等十州，仍散居灵、夏等界内。”④

二、第二次大迁徙

“安史之乱”后，唐王朝尽撤河西戍军人卫京师，吐蕃乘虚攻占河西陇右数十州之地，随后又进据关中，经常与党项羌联合起来寇掠，给唐王朝带来了很大的威胁。为了阻断吐蕃与党项的

① 《资治通鉴》卷 202 高宗永隆元年。

② 《资治通鉴》卷 220 肃宗乾元元年。

③ 《旧唐书》卷 198《党项羌传》：“庆州有破丑氏族三、野利氏族五、把利氏族一。”

④ 汤开建先生考证，天授三年内附党项当为万余口，见《隋唐时期党项部落的迁徙》，载《西夏文史论丛》。

联系，以防止酿成更大的边患，唐朝边帅郭子仪等将散处在盐、庆等地的党项分三支迁往他处。

一是迁往银州以北、夏州以东的平夏地区。《新唐书·党项传》载：“（郭）子仪以党项、吐谷浑部落散处盐、庆等州，其地与吐蕃滨近，易相胁，即表徙静边州都督、夏州、乐容等六府党项于银州之北、夏州之东。宁朔州吐谷浑住夏西，以离沮之。召静边州大首领左羽林大将军拓拔朝光等五刺史入朝，厚赐赍，使还绥其部。”这些迁往银州之北、夏州之东的党项部落就是后来著名“平夏部”的前身。

二是迁往灵州。郭子仪表徙静边州都督等六府党项于银州之北，夏州之东的同时，“又表置静边、芳池、相兴三州都督、长史，永平、旭定、清宁、宁保、忠顺、静塞、万吉等七州都督府。于是破丑、野利、把利三部及思乐州刺史拓拔乞梅等皆入朝”[①]。据《新唐书·地理志》上述 10 州均隶属灵州都督府，显然是将庆州破丑、野利、把利、拓跋等部迁往灵州后设置的。

三是迁往延、绥二州。《新唐书·党项传》在拓跋乞梅皆入朝的后面，又记述“宜定州刺史折磨布落、芳池州野利部并徙绥、延州”。他们成为后来“南山党项”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宋代横山地区野利家族与府州折氏的前身。至于留在庆州的党项，后来形成了著名的“东山部”[②]。

① 《新唐书》卷 221《党项传》。

② 《资治通鉴》卷 249 宣宗大中五年胡三省注：“党项居庆州者，号东山部；居夏州者，号平夏部；其窜居南山者，为南山党项。赵珣《聚米图经》：‘党项部落在银、夏以北，居川泽者，谓之平夏党项；在安、盐以南，居山谷者，谓之南山党项’。”宋初，曾任延州节度判官宋琪上言：“党项界东自河西银、夏，西至灵、盐，南距鄜、延，北连丰、会。厥土多荒隙，是前汉呼韩邪所处河南之地，幅员千里。从银、夏至青、白两池，地惟沙碛，俗谓平夏；拓跋，盖蕃姓也。自鄜、延以北，多土山柏林，谓之南山；野利，盖羌族之号也。”（《宋史》卷 264《宋琪传》）

第三节　内徙党项羌的社会经济

一、牧农业及手工业

社会经济发展的诸多因素中，最根本的是生产力的发展，而生产力的发展离不开人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尤其在生产发展相对低下的古代，自然环境对社会生产发展的影响更为显著。银夏之北雨量稀少，除茫茫沙海外，地面多生牧草，活跃在上述地区的内迁党项，长期以游牧为生，甚至西夏建国后依然如此。《文苑英华》卷 370 《夏平》载：“夏之属土广长几千里，皆流沙，属民皆杂虏，虏之多者曰党项，相聚为落，于野曰部落。其所业无农桑事，畜马、牛、羊、骆驼。”陇右庆州及横山山界，山岳绵亘，水草丰茂，羌夷种落散处其间，“戎夏杂居”，生活在这一地区的党项羌部落，有固定的活动区域，过着定居半定居畜牧生活，后来他们中间的一部分逐渐学会了农耕。

为了巩固沿边屏障，唐朝一贯重视列为“编户”蕃戎的农业生产，河曲六州突厥“自服王化，列为编氓，安其耕凿，积年有序”[①]。开元九年（721），唐朝镇压了兰、池州突厥康待宾的反抗，将河曲六州残胡五万余口迁往许、汝、唐、邓等州，党项羌随之徙居河曲，继承了六州胡留下的农田设施。

开元八年（720），吐蕃、党项等少数民族纷纷内附，唐玄宗敕关内、河东、河西入朝新降蕃酋曰：“无令田陇废业，含养失所，递相勉谕，以悉朕意。”[②] 大中五年（851），南山党项迫于饥寒，奋起反抗，唐政府即“于银、夏境内授以闲田”[③]。由此

① 《册府元龟》卷 992 《外臣部·备御五》。
② 《唐大诏令集》卷 128 《赐入朝新降蕃酋敕》。
③ 《资治通鉴》卷 249 宣宗大中五年。

可见，至迟中唐以后，在唐政府的扶持与帮助下，一部分党项人开始学会了农耕。当然，这部分党项羌的人数不多，党项羌大量转向农耕生活，是李继迁祖孙三代占据河套平原与河西走廊以后的事了。

文献没有记载内徙党项羌手工业情况，但可以想见，以制作毡毯和纺织毛褐为主的家庭手工业比较普遍，因为除居住城镇的贵族外，住毡帐，衣裘褐，仍是普通党项人的生活习俗。直到西夏建国前夕，开国皇帝元昊还明确指出：“衣皮毛，事畜牧，蕃性所便。’①

酿酒是党项人又一传统手工业，早在青藏高原就开始“求大麦于他界，醞以为酒”②。内徙后对外交流的发展与农耕生活的出现，为酿酒业提供了广阔的前景。宋人庄绰指出：“关右塞上有黄羊无角，色类獐麂，人取其皮以为衾褥。又夷人造嚺酒，以荻管吸于瓶中。老杜送从弟亚赴河西判官诗云：‘黄羊饫不膻,芦酒多还醉’,盖谓此也。’③ 杜甫诗中的芦酒，当为包括党项羌在内的西北少数民族酿制的酒，这种酒多饮才醉，度数较低。

总之，内迁党项手工业生产比较原始，且多为围绕畜牧业的副业，至于冶金、锻造、砖瓦、陶瓷、造纸、印刷等手工业生产部门，主要是西夏建国后才发展起来的。

二、商业交换

随着生产的发展，剩余产品的增多与社会分工的扩大，商品交换是不可缺少的了。从贞元三年（787）唐朝“禁商贾以牛、

① 《宋史》卷 485 《夏国传上》。
② 《旧唐书》卷 198（党项羌传》。
③ （宋）庄绰：《鸡肋编》卷中。

马、器械于党项部落贸易”的禁令来看①，在中唐或更早，党项羌对外商业贸易业已发生，及至唐末五代，这种贸易日趋繁盛，特别是党项马成为当时驰名的商品。②

内徙党项对外交换大致有贡使贸易、榷场贸易与民间和市三种形式。贡使贸易是以进贡马、驼为名，实为换取中原王朝银、绢及其他赏赐品的一种贸易。从现有材料来看，这种贸易在后唐时期最为频繁。

表 1－1　　五代党项贡奉一览表

年　代	内　容	资料来源
后唐庄宗同光二年（924）	二月，党项遣使朝贡	《册府元龟》卷 972
同上	十月，党项进白驴	《旧五代史》卷 32《唐书·庄宗纪》
同上	十二月，党项遣使贡方物；党项薄备香来贡良马，其妻韩氏进驼马	同上及《册府元龟》卷 972
同光三年（925）	正月，河西郡落折骄儿贡驼马	《册府元龟》卷 972
同上	二月，河西郡族折文通贡驼马；党项折愿庆贡方物	同上
后唐明宗天成二年（927）	九月，党项使如连山来	《新五代史》卷 6《唐·明宗纪》
天成三年（928）	党项、吐蕃相次朝贡	《册府元龟》卷 972
天成四年（929）	八月，党项首领朝贡	《旧五代史》卷 40《唐书·明宗纪》

① 《旧唐书》卷 198《党项羌传》。

② 元稹：《元氏长庆集》卷 23《估客乐》：“求珠驾沧海，采玉上荆衡，北买党项马，西擒吐蕃鹦。”可见党项马与沧海珠、荆衡玉、吐蕃鹦一样，为当时的驰名商品。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续表

年　代	内　容	资料来源
天成四年（929）	八月，党项折遇明等来贡方物	《册府元龟》卷 972
同上	九月，党项折文通进马	同上
同上	十月，党项首领来有行进马 40 匹	同上
同上	十月，夏州进白鹰	《旧五代史》卷 40 《唐书·明宗纪》
后唐明宗长兴元年（930）	正月，党项使折七移来	《新五代史》卷 6 《唐·明宗纪》
长兴二年（931）	正月，河西党项折七移等进驼马	《册府元龟》卷 972
同上	十一月，党项等来朝贡	同上
同上	十二月，党项首领来进所得契丹旗、马	同上
长兴四年（933）	十月，夏州李彝超进马 50 匹	《册府元龟》卷 169
后唐末帝清泰二年（935）	四月，党项拓跋黑连欲入朝贡奉，从之	《册府元龟》卷 972
后晋开运四年（947）	振武节度使、府州团练使折从远入朝，更名从阮	《资治通鉴》卷 286
后汉隐帝乾祐二年（949）	夏州节度使李彝殷献马谢隶静州为属郡	《册府元龟》卷 166
乾祐三年（950）	永安节度使折从阮举族入朝	《资治通鉴》卷 289

上表可见，五代时特别是后唐庄宗时，党项与中原的贡使贸易相当频繁，每年多达三四起，天成四年（929），后唐庄宗御中兴殿，阅蕃部进马，枢密使安重诲奏曰：“吐浑、党项近日相次进马，皆给还马直，对见之时，别赐锦綵，计其所费，不啻倍价，渐成损耗，不如止绝。”庄宗曰：“尝苦马不足，差纲远市，今蕃官自来，何费之有？外蕃锡赐，中国常道，诚知损费，理不

可止。”自是蕃部羊马不绝于道。[①] 著名诗人白居易写道：“城盐州、城盐州，城在五原原上头，……鄜州驿路好马来，长安药肆黄耆贱。[②] 此诗正是这种贡使贸易的生动写照。

榷场贸易，即由中原王朝在沿边置场，进行大规模货物交易。后唐明宗鉴于“党项皆诣阙，以贡马为名，国家约其直酬之，加以馆穀赐与，岁费五十余万缗，有司苦其耗蠹，故止之’[③]，乃“诏沿边置场买马，不许蕃部直至阙下”[④]，按，此为党项羌对外榷场贸易之始，它表明内徙党项羌对外贸易已发展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民间互市，即与沿边汉族人民之间的商品交流，它是党项羌人进入内地后，对外发生最早也最普遍的一种贸易，有的有固定的时间与地点，有的则不固定，往往以汉族商贾入其部落贸易的形式出现。

内徙党项羌对外贸易有其明显的时代特点，一是除生活日用品外，兵器甲胄的交换占有突出的地位。史载，党项俗尚武力，“然器械钝，苦畏唐兵精，则以善马购铠，善羊贸弓矢”[⑤]。尽管唐王朝屡屡下令禁绝兵器贸易，但商人为牟取厚利，往往以各种手段走私出境；或边臣因循，“却不遵守”[⑥]。实际上兵器贸易从来没有禁绝过。

① 《册府元龟》卷 170 《帝王部·来远》。

② 白居易：《白氏长庆集》卷 3 《新乐府》。

③ 《资治通鉴》卷 276 明宗天成四年。《五代会要》卷 29 《党项羌》：“自上御极已来，党项之众竞赴都下卖马，常赐食于禁庭，醉则连袂歌其土风。凡将到马，无驽良，并云上进国家，虽约其价直以给之，然计其馆给赐赍，每年不下五、六十万贯。大臣以为耗蠹中原，无甚于此，因降敕止之。虽有是命，竟不能行。”《册府元龟》的记载稍异。

④ 《册府元龟》卷 621 《卿监部·监牧》。

⑤ 《新唐书》卷 221 《党项传》。

⑥ 《唐大诏令集》卷 130 《平党项德音》。

二是唐末藩镇割据，吏治腐败，沿边将帅与奸商上下齐手，对党项羌的贸易带有很大的掠夺性。党项羌有以羊马来市者，边将“恣其贪婪，不顾危亡，或强市其羊马，不酬其直，以是部落苦之”①。著名诗人元稹也指出：“河朔之间，丰有水草，内附诸夷，多以畜牧为事。吏二千石已上，皆（弗）能拊循，竞致侵削，藉其蹄角齿毛之异，廉者半价而买，贪者豪夺。”②

三是商品交换为中原王朝对党项羌进行羁縻统治的一项重要内容。后唐庄宗即位后，“欲来远人，党项之众竞赴都下。尝赐酒食于禁庭，醉则连袂歌土风以出。凡将到马，无驽良，并云上进国家，虽约其价以给之，及计其馆穀锡赍，所费不可胜纪”③。每年花费如此之巨，并且无论良驽一律收买，显然不仅仅是为了买马。同时禁断贸易也是制服党项羌的一种重要手段。后周显德二年（955），定难节度使李彝兴因折德辰也升为节度使，和其并列，心中不平，“寒路不通周使”。世宗认为：“夏州惟产羊马，贸易百货悉仰中国，我若绝之，彼何能为？”乃遣供奉官齐藏珍赍诏书责之。“彝兴惶恐谢罪”④。

三、结语

党项羌内徙后社会经济的发展，有着深刻的社会人文及自然地理等方面的原因。

首先，客观上得地理之优。党项在甘、青、川三省毗连的草原上，地势高寒，土无五谷，与外界来往很少，而后来迁居的西

① 《旧唐书》卷 198 《党项羌传》。《旧唐书》卷 177 《崔慎由附父从传》：长庆二年（822）崔从检校礼部尚书、鄜州刺史、鄜坊丹延节度使，“党项羌有以羊马来市者，必先遗帅守，从皆不受，抚谕遣之。群羌不敢为盗”。像崔从这样仅是个别。

② 《全唐文》卷 649 《授王元琬银州刺史制》。

③ 《册府元龟》卷 621 《卿监部·监牧》。

④ 《资治通鉴》卷 292 后周世宗显德二年。

北地区则大不相同，从畜牧业的角度来讲，这里水草肥美，牧场辽阔，自古以来是众多游牧民族和游牧部族活动的场所。从农业方面来说，这一地区也宜于农作物的耕种。秦汉王朝曾在这里大规模屯垦实边；盛唐在鄂尔多斯高原南缘的河曲之地设立六胡州，大批突厥人被“列为编甿”后，“安其耕凿，积年有序”。至于南山党项所在的山界，则有无定、大理等河水灌溉，这一切都为党项羌人逐渐学会农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从商业贸易方面来看，党项羌人徙居的鄂尔多斯南缘及河套地区，在地理位置上处于中原农耕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的联结处，既是中原通往西北的交通枢纽，又是少数民族同中原贸易的要道。因此，党项羌人徙居后，对外贸易显示出旺盛的生机，不仅交易本民族出产的马、牛、羊、驼，而且大做青白盐、茶叶等商品的转手贸易，出现了一批专以贸易为生的党项商人。这种转手贸易甚至做到唐朝与吐蕃的交易上。《资治通鉴》卷 232 载：贞元三年（787）七月，唐德宗与李泌讨论戍卒给养问题，李泌说：“今吐蕃久居原、会之间，以牛运粮，粮尽，牛无所用，请发左藏恶缯染为彩缬，因党项以市之，每头不过二三匹，计十八万匹，可致六万余头。”德宗善其策，“即命行之”。回鹘从唐朝手中换取的马价绢，有时也转手卖给党项。①

其次，受先进的汉族文明的影响。党项羌内迁后定居的地区，原来都是汉族人民长期过着封建社会生活并创造着封建文明的所在，党项羌人民在这里定居下来后，这些先进的汉文明对他们在新环境中进行生产劳动是极为有利的，诸如先进的生产技术、金属工具特别是铁器的使用，河渠灌溉设施等等，对于党项

① （唐）李德裕：《李卫公会昌一品集》卷 13《论太原及振武军镇及退浑、党项等部落互市牛马骆驼等状》载：“缘回鹘新得马价绢，访闻塞上军人及诸蕃部落，苟利货财，不惜驼马，必恐充为互市，招诱外蕃，岂惟资助虏兵，实亦减耗边备。”

羌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经济的发展，都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因此，内迁定居和半定居下来的党项羌人，不仅在畜牧业方面显示出广阔的前景，而且还逐渐学会了农作物的耕种，特别是缘边蕃汉杂居地区，受汉文明的影响更为直接。

再次，有一个相对安定的生存环境。党项羌历史上有两次大规模的迁徙，一次是从青藏高原的东部迁往陇右庆州，一次是从陇右庆州迁往银夏与延绥等地。虽然两次迁徙的背景不同，安置方法也不一样，但就客观效果来看是相同的，即两次迁徙都是把党项人从发生战乱的地方迁走。尽管经过迁徙之后，原有的人口、牲畜、财物必定遭受相当大的损失，但能在一个相对安定的环境下致力于生产，繁殖人口，比经常处于战争和奴役的威胁下，终日民不聊生，毕竟得多失少。特别是拓跋等部迁到银夏地区后，经过一段较为安定的发展，出现了“部落繁富，时远近商贾赍缯货入贸羊马”的局面[①]，从而走上了建立西夏王国的道路。

此外，唐王朝为了加强对党项羌的羁縻统治，巩固边防，给他们授以闲田，鼓励从事定居的农牧业；除禁断兵器贸易外，允许其他生活日用品的自由贸易；一度挑选宽明练达、熟于边事的官员为边帅，这些也都有利于内徙党项羌社会经济的发展。

第四节　夏州拓跋政权及其奴隶制与封建制相结合的社会形态

党项羌内徙后，仍以氏族部落为单位，形成一个个独立的社会实体。但随着生产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这种社会实体已非内

① 参见史卫民：《党项拓跋部的迁移及其与唐五代诸王朝的关系》，载白滨编《西夏史论文集》。

徙前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的氏族部落，而是在氏族外衣下具有明显的阶级压迫性质，这在夏州拓跋氏、府州折氏等强宗大姓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天宝末年平夏拓跋部首领因战功，“擢容州刺史、天柱军使，其裔孙拓拔思恭，咸通末窃据宥州，称刺史”①。公元 881 年初，黄巢起义军攻占长安，僖宗仓皇出逃成都。是年三月，唐政府以郑畋为京城四面诸军行营都统，诏令各地蕃汉将士“赴难”。宥州刺史拓跋思恭因率蕃汉兵镇压黄巢起义“有功”，被唐僖宗封为夏州节度使（后更号定难军节度使），赐皇姓李，封夏国公，统辖银、夏、绥、宥四州之地，从此，夏州拓跋氏成为名副其实的地方藩镇。

政治上夏州拓跋政权从一开始就有地方与民族的两重性，较之其他藩镇，享有更大的独立性，可世袭节镇，自行任免州县官吏。唐末拓跋思恭卒后，其弟思谏袭位；思谏卒，思恭孙彝昌嗣；910 年彝昌为部将高宗益所杀，其族父仁福继位； 933 年仁福死，其子彝超自袭为“留后”。后唐明宗想乘机消灭夏州拓跋政权，下令李彝超与彰武（治延安）节度使安从进对调，并派邠州节度使药彦稠率兵 5 万，武装保护安从进赴任。

在这生死存亡的关头，李彝超率蕃、汉军民坚守夏州。夏州城为赫连勃勃蒸土所筑，坚如铁石，唐军挖地道至城墙根，凿斩不能入，“党项万余骑徜徉四野，抄掠粮饷，官军无所刍牧。山路险狭，关中民输斗粟束蒿费钱数缗，民间困竭不能供”②。李彝超乘机展开政治攻势，登城对安从进说：“夏州贫瘠，非有珍宝蓄积可以充朝廷贡赋也，但以祖父世守此土，不欲失之。蕞尔

① 《新唐书》卷 221 《党项传》。

② 《资治通鉴》卷 278 后唐明宗长兴四年。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